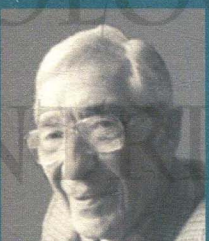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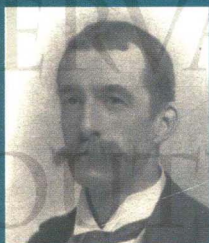




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二〇一—計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西觀漢記

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

夏含夷 著

Edward L. Shaughness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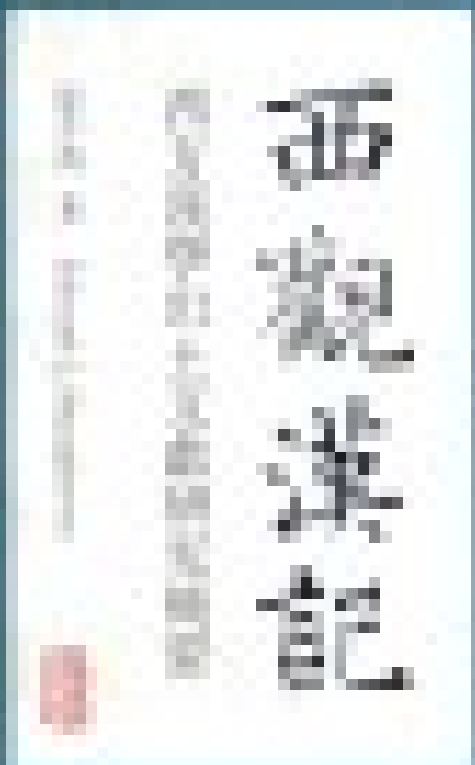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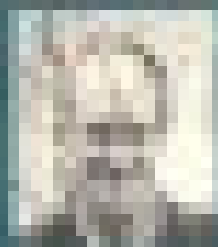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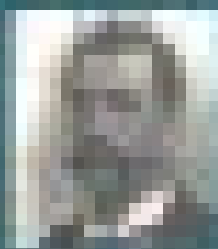


◎

◎ 西觀漢記

◎

◎ 西觀漢記



西觀漢記

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

夏含夷 著 Edward L. Shaughnessy



CHINESE ANNALS
IN THE WESTERN
OBSERVATORY:
AN OUTLINE
OF WESTERN
SINOLOGY'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UNEARTHED TEXT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 / (美) 夏含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325-8676-9

I. ①西… II. ①夏… III. ①漢學—文獻—研究—西方國家 IV. ①K207.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92572 號

西 觀 漢 記

——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

[美] 夏含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00×970 1/16 印張 41.75 插頁 5 字數 601,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8676-9

K·2411 定價：14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內。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敘述中做特別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錄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說每一部分所敘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別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敘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敘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敘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

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敘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錄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敘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說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錄: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漢語裏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9-120.

“1881”、“1934”為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說,“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別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為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為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為了尋找方便,沒有特別意義。有的

研究成果的內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錄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內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目 錄

凡例	001
序言	001

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

第一章 西方漢學中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概要	009
一、中國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總論	010
二、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原始社會作用	016
三、中國文字的性質	022
四、古文字學方法論	031
五、西方漢學家所編纂的古文字學相關工具書	037
六、小結	040
第二章 西方漢學中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小傳	042
一、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042
二、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 1854—1952)	045
三、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048
四、錢存訓(Tsuen-hsuein TSIEN, 1909—2015)	051
第三章 西方漢學中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書目	054

契 於 甲 骨

第一章 西方漢學甲骨文研究概要	085
一、從方法斂到吉德燁	086
二、七八十年代編輯和出版甲骨藏品的工作	105

三、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	108
四、九十年代法國的研究成果	115
五、2000年以後的研究成果	119
第二章 西方漢學甲骨文研究小傳	121
一、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	121
二、司禮義(Paul L-M SERRUYS, C.I.C.M., 1912—1999)	125
三、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 1932—2017)	128
四、高島謙一(Ken-ichi TAKASHIMA)	131
第三章 西方漢學甲骨文研究書目	135

鏤於金石

第一章 西方漢學金石研究概要	201
一、銅器銘文研究	201
二、石刻研究	234
三、2000年以來的銅器銘文研究	240
第二章 西方漢學金石研究小傳	247
一、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	247
二、巴納(Noel BARNARD, 1922—2016)	249
三、翁有理(Ulrich UNGER, 1930—2006)	252
四、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1923—2014)	257
第三章 西方漢學金石研究書目	259

書於竹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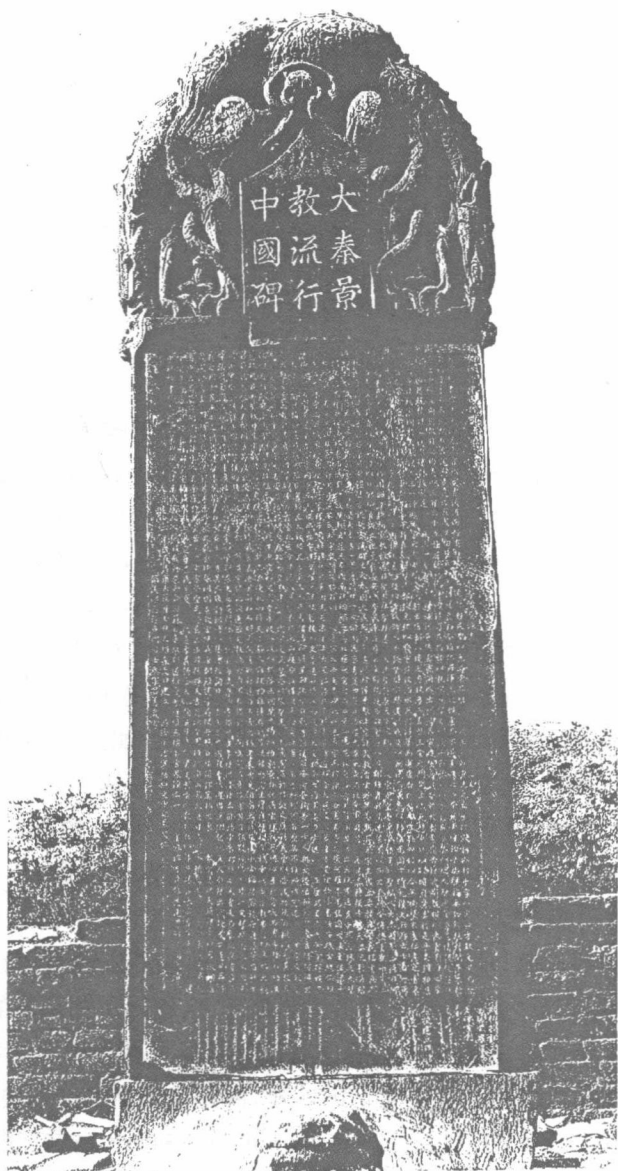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西方漢學簡帛研究概要	323
一、1900年至1970年西方漢學簡帛學術成果	325
二、汲冢竹書	337

三、1970 年代以後西方漢學簡帛學術成果	344
四、綜合研究	430
第二章 西方漢學簡帛研究小傳	459
一、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2—1945)	459
二、何四維(A.F.P. HULSEWÉ, 1910—1995)	462
三、魯惟一(Michael A.N. LOEWE)	464
四、艾蘭(Sarah ALLAN)	467
第三章 西方漢學簡帛研究書目	470
附錄一 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	581
附錄二 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601
索引一 作者西文姓名索引	610
索引二 作者中文姓名索引	634
後記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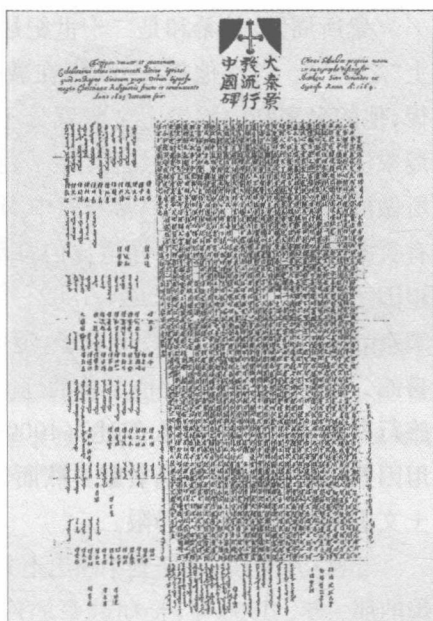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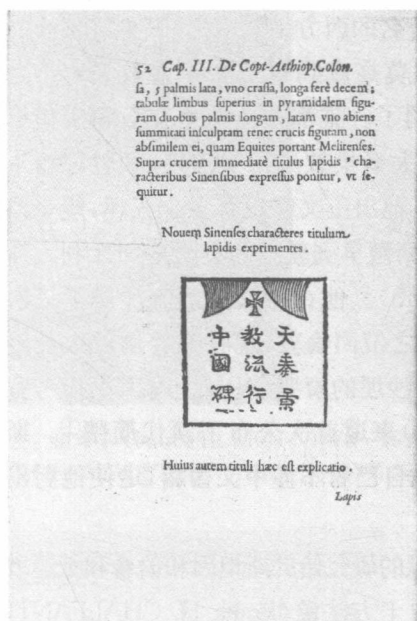
序 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腳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敘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敘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況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內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祿(Alvaro SEMEDO, 1585—1658, 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祿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穌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Prodrom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 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照片，約 1892 年；Henri HAVRET（夏鳴雷），*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gan-fou*（西安府的天主教石碑）（Chang-hai: Mission catholique, 1895—1902），圖版



左：Athanasius KIRCHER（基爾施），*Prodrom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Rome, 1636），《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方首次提及；右：Athanasius KIRCHER（基爾施），*China Illustrata*（中國之圖表）（Amsterdam, 1667），《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銘文在西方首次出版

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LOT, 1878—1945）等^①。

^① Alexander WYLIE（偉烈亞力），“On the Nestorian Tablet at Se-gan Foo”（關於西安府的景教石碑），*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1855—1856）：275—336；James LEGGE（李雅各），*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 Fu*（西安府的景教紀念碑）（London: Trübner, 1888）；Paul PELLLOT（伯希和），*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西安府的景教銘文），ed. Antonino FORTE（Kyoto: Scuola de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96）。最近另外一個唐代的景教石碑又在洛陽出土；見張乃翥，《一件唐代景教石刻》，《中國文物報》2006年10月11日，第7頁；張乃翥，《跋河南洛陽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65—73頁；羅炤，《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轉下頁〉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閱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沒有多少興趣，幾乎沒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敘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①。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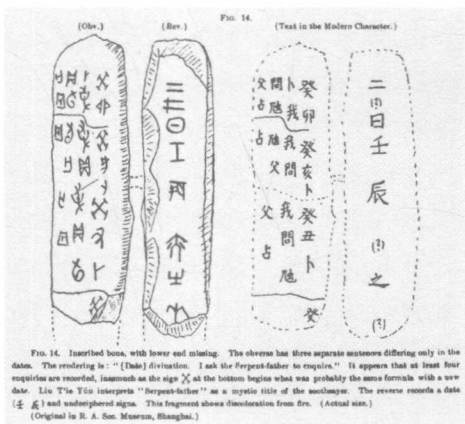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茲堡，在匹茲堡卡內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說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說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為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為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眾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接上頁）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7年第6期，第30—48頁；葛承雍編，《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經幢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Michael KEEVAK, *The Story of a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 - 1916*（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8）；Matteo NICOLINI-ZANI（馬明哲），“The Tang Christian Pillar from Luoyang and Its *Jingjiao* Inscription: A Preliminary Study”（洛陽出土的唐代天主教石幢及其景教刻本：初步研究），*Monumenta Serica* 57（2009）：99 - 140。

① Marc Aurel STEIN（斯坦因），*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敘述）（London: T.F. Unwin, 1903）。



左：伯希和(Paul PELLIOU, 1878—1945)在敦煌莫高窟閱讀敦煌卷子；右：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第二次流沙調查



左：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開頭一段所作的摹本、釋文和翻譯；右：方法斂對自己收藏的甲骨所作的摹本、釋文和說明，見 Frank H. CHALFANT (方法斂), *Early Chinese Writing* (中國早期書寫) (Pittsburgh: The 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06), 第 22 頁(左)、第 33 頁(右)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

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
